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1.004

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传承困境与解决思路 ——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任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所,北京 100101)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有着巨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而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存储库,对它的深入挖掘与传承,可以为乡村社区的文化重构起到关键作用,它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具有治理、整合、教化的功能。目前而言,由于城市的虹吸作用,让乡村社会表现出文化撕裂的状态,其存在文化空间遭破坏、文化网络存断裂、文化礼俗少传承、文化遗产缺人才等问题。如何振兴乡村文化,传承农业遗产,本研究认为根据“空间情境—互动网络—仪式认同”的互动仪式理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活态保存乡村文化空间、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重建乡村文化认同感、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以此把优秀价值观念有机融合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之中。让乡村文化得以振兴,农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功能;困境

中图分类号:G127;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1-0021-08

Social Functions, Inheritance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N Chao

(Institute for City Situation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has great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repository of China's excellent cultural values. Its in-depth excavation and inheritance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a strong social attribute, and has the functions of governance, integ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t present, due to the siphon effect of the city, the rural society shows a state of cultural distor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the rupture of cultural network, the lack of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etiquette and customs, and the need of tal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active ritual theory of "spatial context - interactive network - ritual identity", we need to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the preservation of living rural cultural spa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ultural network, the restore of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cultural talents. By doing so, excellent traditional value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rural live and work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and pass down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functions; predicament

乡村振兴,不仅要增加农民收入,更要振兴乡村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焕发乡村文明新气息。”显然,农业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将起到价值引导功能。

广义而言,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根据生存需要而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各种生产技术经验和农业生活经验,它以物质、仪式的形式,保存下来古人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与道德规矩,并以此共同构成了文化空间^[1]。简单讲,农业文化

收稿日期:2022-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L015);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北京城市副中心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对策研究(KY2023C0009)。

作者简介:任超(1985—),男,黑龙江讷河人,助理研究员,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乡文化。

遗产就是传统农业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的综合体系^[2]。农业文化遗产让地方知识得以留存、情感结构得以显现,精神信仰得以传承。尤其在当前社会,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道德规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谱系为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资源,一方面,它为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提供伦理支持^[3]。另一方面,为后工业化社会,人将如何发展,人与自然如何共处提供现实根据^[4]。通过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传承中遇到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促进农村乡村文化振兴,为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助力。

一、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传统乡土社会,农业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属性^[5],包括社区治理功能、社区整合功能、社区教化功能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中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一)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对乡村社区的治理功能

乡村作为一种空间形态,是保存农业遗产的重要基础。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乡村的地理性标志的文化空间,它是村民获得身份认同、情感联结、习得地方性知识,进而规范个体行为的媒介。

乡村社区治理,往往借助传统乡村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共识和沟通网络两个要素得以实现:(1)文化共识。文化共识是基于地方性知识构建起来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地方社区的基因^[6],是村民在确定时间和地域内,通过共同的交流方式,信仰习俗使得社群成员在思维范式与行为模式上达成一致^[7]。地方性知识深深嵌入到本地人的生活与生产之中,它已经成为村民相互认同、维持村民团结的内生动力,是乡土社会治理得以被认同的重要基础。(2)沟通网络。在农业文化空间中熟人社会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维系着乡村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规范。这些规范往往在处理各种村民矛盾,解决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方面起到关键作用^[8]。李志农、乔文红^[9]曾以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为研究对象,阐释出乡土社会中的文化遗产在维护村落社会秩序,规范村落个体行为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乡村社会中的熟人沟通网络,也实现了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文化空间的互构交融,通过传统文化遗产提供的空间实现了村中的社会治理功能。但随着农民的离村离乡,以及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致使乡土社会中的沟通网络正在

发生断裂,沟通渠道正在阻塞^[10],这造成乡村中权利结构失衡,一些村民的诉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乡村社会中的不公正、不信任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乡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关系逐渐消失^[11]。

(二)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信仰对乡村社区的整合功能

农业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不是形式体系,而是一种包含情感观念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间的宝贵共存方式,是一种文化信仰传统。这种传统依靠信仰空间把村落居民团结在一起,整合起来^[12]。

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宗祠与庙宇充当着文化信仰的关键载体。宗祠作为村落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它承载农业文化遗产的信仰文化,“村村有宗祠,无祠不成村”已成为东南地区村落社区的信仰核心,以宗族为基础的社区认同不仅解决村民矛盾,也是建立乡村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祖先间的重要纽带^[13]。庙宇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宗祠的进一步延展。它除了建构当地村落的信仰体系,还起到整合当地关系网络、沟通人际关系的作用。表现出对村落秩序的系统性整合功能包括:人神之间、信众之间、家户之间、村落之间、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通过庙宇整合在一起^[14]。在这种关系下,借助对庙宇的维持与管理,发展出新的权利资本,这种资本是群体权威代言人,它作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化的结果,获得群体的支持与力量,进而把村民团结在此周围^[15]。正是由于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中具有如此特性,因此,它所发挥的作用与众多的制度保障有着相同效果,很多时候乡村治理,往往借助非正式的制度保障来保证乡村社区内的良性运转,让乡村社区内的各种关系沟通起来^[16]。

显然,传统文化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它的位置。“世俗化”的信仰或信任体系在文化认同危机的情景中成为替代性的生活策略,并对构造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做出一定贡献。如果传统农业文化在乡村社会解体,其农民信仰体系将成为真空,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最终发生崩塌,那么乡村社会的整合功能必将受到巨大影响^[17]。

(三)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村规民习对乡村社区的教化功能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包含农业生活方式的系统,它蕴藏着农业社会方式的运转规则。村规与民习就是其中重要遗产,在乡村治理中:由于近代

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导致乡村模式发生转变,政府对乡村干预能力下降。这让乡规民约的规范作用在乡村社会变革中显现出来^[18]。通过乡村文化礼仪的熏染,村落个体通晓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监督网络也让村落个体收敛其越轨行为^[19]。在体验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勤劳、节俭的品格,培养了耐心的品质^[20]。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其包含着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21]。正是农业文化的这种社会功能,建立了村落的诚信,处理了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网络;规范了村落秩序,处理了人与村的关系;调和了村落社区的发展,处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因此,乡村振兴,更应该振兴乡村村落这个文化空间,让原有的社会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困境

随着乡村社会文化结构发生解体,乡村社会精神文化缺失,其相互攀比、散漫虚浮、赌博、迷信等不良风气与陋习在乡村社会滋生蔓延,让当前的乡土文化被打上“落后”与“穷困”的烙印,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扭曲和迷失^[22],受这种风气以及现代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农民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日渐下降,原有的承载村民参与的政治空间、节日时举行仪式的信仰空间都正在衰落,随着文化空间的衰落,文化网络也发生断裂。农民对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正在失去认同感^[23],这让农业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传承困难,给乡村文化的振兴带来巨大阻碍。

(一)乡村文化空间遭破坏

乡村不仅是与城市相区分的地理区域,更是承载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村落空间不仅提供了物质载体,更传承了古老的农业社会经验。农民利用乡村这个物理空间与熟人网络,在群体生活中获得集体认同。父辈借助这个空间把已有的乡土知识体系与过往技术经验传授给子孙,并在这种代际交往中,让子孙习得在乡村社会中生存的技术^[24]。同时,只有在乡村空间内,一些民俗节庆才能被操演,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操演着各种具有表达长幼有序的仪式化传统,以此加深村民对地方知识的掌握。

但因为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许多乡村转化为城市一部分,进而被动消失。很多乡村中年轻居民不断逃离乡村,原有父传子继的地方性文化在乡村社

会的不断变迁中消失殆尽^[25],这更导致原有的乡村文化空间衰败与解体。张良^[26]在分析乡村文化空间的衰落时指出,现代社会是破坏乡村文化空间的根本原因,在这基础上,乡村原有的信仰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消遣空间以及政治空间开始走向流动、开放、异质。原有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仪式不能得到演练,进一步导致地方性知识构成的乡村文化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发生解体,乡村文化空间的破坏,让农业遗产的有序传承缺少了必要的空间基础。

(二)乡村文化网络存断裂

“文化网络”是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乡村中以各种组织为表现形式,通过感情纽带或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共同体。它会激发人们的责任感与群体认同。

农业遗产的传承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或社会组织就能解决的。它是需要本地村民、乡土精英共同参与,相互支持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只有完善乡村文化网络,才能链接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与村中精英,让多元参与者形成合力。传统乡村的文化网络其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依托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结成的血亲关系,编织出村落社会的熟人网络。以熟人网络为基础的文化网络,在解决村落公共事务、处理社群内部矛盾起到了决定作用,并成为村庄治理与个人行动的基本逻辑。

但随着现代化推进,血亲关系伴随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日渐淡化。这也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熟人网络的作用日益衰微,促使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也彻底失效^[27]。失去了以熟人网络的认知基础,那么在维持身份认同、处理村内公共事务、解决村落矛盾上面都造成巨大障碍。陈楚杰与袁梦倩在江苏省J市的农村调研中就发现,当前农村社会的村庄个体的身份认同混杂,原有的共同价值观念已经解体,有的年轻人、甚至在外多年的中年人都认为家乡的一些繁文缛节规矩,阻碍自己谋求更高的收入。过去集体意义下的价值符号在当前遭受瓦解。同时,由于身份认同解体,致使村庄内的村民存在着传统的、现代的各种不同价值观,因此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上,很难形成共同意见。传统村落社区内部有效构建的公共文化行动基础发生动摇,原有乡土社会中的文化网络发生彻底断裂。并且由于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那么在缺少文化网络,缺少有效沟通的乡村社会内,村落中的伦理事务、日常事务都成为乡村发展的绊脚石^[28]。在作为连接共同体的纽带发生断裂

的情况下,那么共同体也意味着最终的解体。

(三)乡村文化礼俗少传承

农业遗产传承得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就是乡村社会的规范行为。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很多礼俗规范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合理性,这也是农业遗产需要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漱溟^[29]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说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靠礼俗维持,而中国将来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仍然要继承很多传统规范,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而言,随着现代理性的深入,维持乡村规范的文化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乡村生活礼俗正在消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道德禁忌的消失。随着时代发展传统道德与现实发生脱离,原有的道德教育和社会行为已经无法约束乡村中的个体,最终造成道德失范^[30]。另一方面,乡风民俗仪式存在社会缺场。致使情感和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割裂,导致乡村社区的文化规范被排除在了公私领域之外^[31]。任超在京郊榆堡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很少参与到村庄的文艺活动中,即使过年过节,多数年轻人依然只围着电脑转、围着手机转,致使很多年轻人与村庄失去了情感连接。道德规范的缺失与民俗仪式的缺场,让乡村社会中的年轻人无法去重复、演练这些包含道德性的仪式,导致乡土文化的濡化作用在农村中慢慢消失。这造成最大的后果就是村庄中的文化记忆被遗忘,年轻人乡土社会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优秀品质被遗弃,让乡村社会出现“失魂”的状况。

(四)乡村文化遗产缺人才

乡村管理人才匮乏是乡村振兴的困难之一,乡村空心化是文化遗产传承困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城市对乡村的强大虹吸效应,很多乡村精英被吸纳到城市之中,这造成乡村的空心化,致使乡村社区缺乏合格的管理人才^[32]。而乡村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又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综合的、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管理手段。由于趋向于老龄化的农村,缺少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致使乡村的文化遗产很难被运营起来,进而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被忽视,文化遗产的保值增值无法实现。由于村庄没有真正管理人才的引领与支持,那么在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很难保证村民主体的利益,这也让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困难。而没有足够资源为当地农民提供经济回馈时,又不能提供充足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时,会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村庄^[33],它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进一步缺乏。

总之,文化空间衰落、文化网络断裂、文化礼俗消失、社区精英缺乏,这些都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要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三、农业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的解决思路

乡村振兴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创造了社会条件。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今的价值,又为乡村社会的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提供了文化支持。如何解决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问题,其中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理论,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根据互动仪式理论,“情境——互动——认同——情感”是一个塑造社会凝聚力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过程。而当前乡村社会农业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传承问题,其实正符合互动仪式解体的过程。因此,重建“空间情境——互动网络——仪式认同”这种机制,依靠精英人才整合村庄情感,带动个体在经济上的增收,共同发力才是解决农业遗产传承问题的关键。

(一)传承需要保护好乡村这个文化空间

保护传承农业遗产,就是保护好村落空间。村落空间是农业遗产的重要载体,更是传承的基础^[34]。如何保护好乡村文化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乡村社会发展与文化空间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35]。乡村文化空间的保护不仅要活态保存、行政保护还要以改促保;在保护乡村原有空间功能的前提下,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便于村民生产生活;在追求乡村旅游经济基础上,不能破坏原有的村落空间形态,把传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发展^[36],一些传统健康的节日仪式应该被恢复并操演,让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融合进旅游之中,通过旅游带动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宣传。同时,随着时代发展,便捷的数字化技术,有必要利用在乡村文化空间的保护上。建立村落的图像数据库,把乡村的文化资源、乡村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数字化保存,通过三维可视化分析,虚拟数字化技术的存储与远程体验,让乡村文化空间一方面在现实中得以保护宣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以虚拟可视的形式留存在历史之中^[37]。

(二)传承需要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

农业遗产的传承作为一种乡村公共性事务,需要乡村文化网络发挥巨大作用,因此重建乡村文化网络是农业遗产传承必要条件。重建新型乡村文化网络,必须整合好政府、村民与乡村精英三者间的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让乡村文化网络重新

得以构建。

首先,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网络的参与主体,必须保护好农民参与的权利与发展的权利^[38]。因此,在乡村保护中必须考虑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只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而剥夺了地方农民发展、增收的需求。最为关键的是地方保护主体的农民必须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他们既是保护对象也是参与者、实践者,因为农民与政府、学者、社会组织文化角色和身份不同,他们长在本村,了解当地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他们知道本地文化资源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化故事,他们能利用自己的所知,增加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性与故事性。他们的参与可以深化、扩大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深度^[39]。

其次,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文化网络引导者,要回归乡土社会,把政治身份转变成村内人身份^[40]。农村基层党群联对农村工作的开展与构建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既要把握乡村特点展开工作,又要成为村中一份子作为一个自然人与村民产生生活联系。不要把自己作为局外人,脱离村内社会。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能把村庄个体团结起来,除了更容易处理村庄事务,解决村庄矛盾外,还让基层党组织与村民产生真正的天然连接。王佳璐、叶敏^[41]在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中已经发现,基层党组织在身份转变后,党群关系变得很紧密,在村中事务的处理上与村民更具有一致性。

最后,乡村精英协助整合多元主体,共建乡村文化网络。公权力与村民集体,需要有中间媒介进行衔接,才能让双方彼此认识和沟通,也只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才能让基层党组织与村民间形成真正的互相理解与共识。而这一媒介,往往由乡村精英来充当。乡村精英一方面具有沟通公权力的基本能力与政治认识,一方面又了解本地风土人情与村庄情况,在协调两者关系上能较好地把握彼此的需要和诉求,他们是乡村文化网络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

显然,乡村文化网络的建立需要三者间协同,依靠三者建立起适应本村特色的地方组织,通过组织解决已有的村民矛盾与公共事务^[42],以此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进一步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

(三)传承需要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感

乡村文化认同感是乡村文化网络的内在表达,它为集体行动提供价值导向,是乡村集体行动的根

本动力。同时,它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动力。

乡村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一方面,需要重塑原有的乡文化认同载体。张新龙等^[43]以鄂西北的立族碑为研究案例,指出在修碑这一共同行动的过程中激发了全村武氏的集体认同感,通过修碑这一仪式整合了已经很弱的乡村认同,弥合了村庄内的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通过这一行为,让已经失范的村庄又一次被规范起来。另一方面,需要乡村的“再集体化”。张红阳等^[44]认为,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中,传统的思想仍然存在,农民的生活逻辑一直没有根本变化,只有在集体力量下的乡村,每个个体才能成为乡村文化的守护者与认同者。他们在以然星村村民调研中发现,然星村民之所以有着极强的乡村认同感与集体责任感,是由于这个村子在集体化后,村集体能够比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社会保障,这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了强大的基础。

不难发现,文化认同感的建立除了需要以一种关乎个人利益的共同行为外,更需要乡村社会能够为个人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与生存保障。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在乡村价值观弱化的前提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借助村民共同参与的文艺活动来培育和践行新的价值观念,以此来整合乡村社会内个体认同感。除此之外,乡村集体还应关心村庄个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样每个村庄个体才会承认是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发挥“主人翁”的意识。

(四)传承需要培育乡村精英人才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除了村民个体的有效参与、基层党组织的支持引导,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又一补充形式。对于乡村精英而言,这个群体是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支持者。乡村精英在乡土社会的文化引导中,往往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很多村庄的第一书记肩负起了乡村振兴的责任。他们也是村庄的外援型精英,这些精英人才自身往往能力强、肯吃苦、有责任感,善于组织与宣传,并真心解决村民实际困难。在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上,驻村“第一书记”由于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基于这一现实。这些嵌入型乡村精英往往能发挥自身优势,在与内生性精英在双方互动基础上,他们能带动优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在村庄内快速传播^[45],能让村民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更能有效激发村民对农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热情。

乡村中的内生型精英,通常具备一定掌握文化遗产管理与传承的能力。它们需要借助政府的帮助,才能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政府在文化支持上在给予资金支持外,要为其赋予文化的组织者、传播者与传承者的责任,并且要为这些内生型精英搭好平台,建立文化传播渠道。

任超^[46]在北京太子务村的调研中就发现,太子务村的武吵子文化遗产就是本村内生型精英作为重要的管理者与传播者出现的,他们借助政府的帮助,组织村民参与大型演出、协助政府制定相应的文化遗产宣传策略、并进入区中小学讲授武吵子课程,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与培育下,不仅让太子务村武吵子走进了校园,还走向了世界。武吵子队伍先后到访过意大利、日本等国家。

除此之外,在数字化经济发展今天,乡村社会内更需要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技术型精英,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吸引本村在外的信息技术骨干,回村发展。政府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这些技术精英提供支持与外部对接,让他们容易把乡土社会中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除了带领村民增收外,也能让这些技术参与农业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乡村品牌推广^[47],让大众对乡村社会重新进行认知。

总之,当前文化遗产的传承既需要外来精英的引导,又需要乡村精英的支持,更需要技术精英的参与,只有三者协同才能让整个村庄互动起来,也只有培育好乡村人才,才能激发起村庄的活力,正是在统一的目标下,农业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一项事业被坚定地执行下去。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传承需要有较为完整的乡村文化空间、因为乡村空间是传承的物质载体与空间载体,它是人们展开活动的空间基础。在这个空间载体之上,要建立顺畅的乡村文化网络通路,除了链接乡村内每个个体成员外,也让他们彼此互动起来,这为价值观的传播与重塑创造条件。同时,借助乡村内的文化网络,可以更好地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感,让村民对村落的价值观念得以内化,成为村民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传承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有可以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相关人才。只有在政府引导下,乡村精英支持与村民全面参与,才能促进村庄观念的整合,文化网络才能坚固,乡村传承空间才能得以维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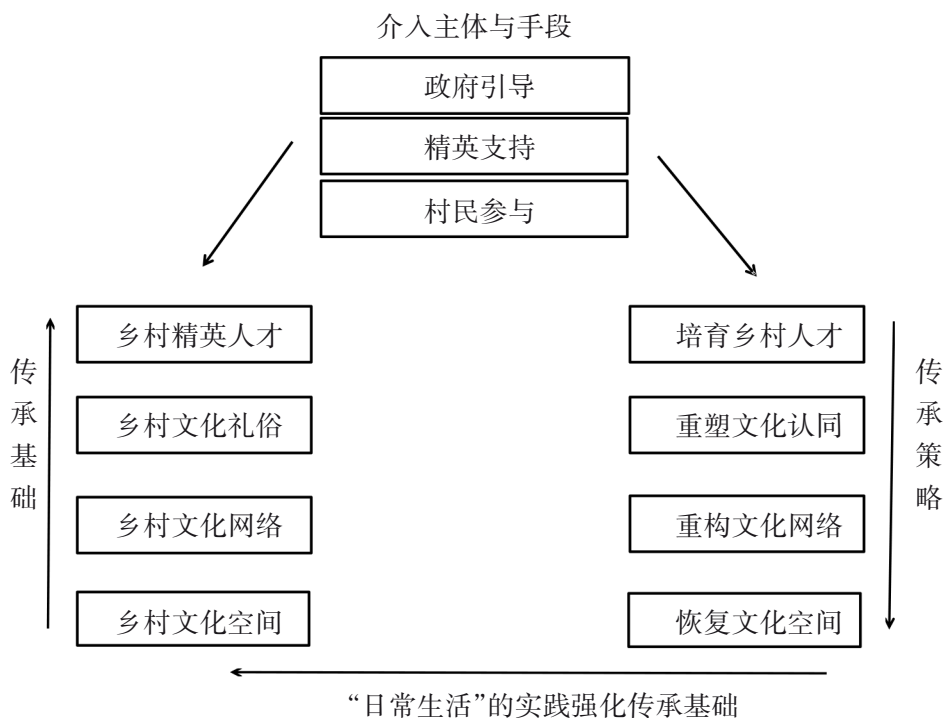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基础与策略

目前而言,乡村中这些传承的要素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如何让传承机制得以落地转化,本研究从现实来看,一是除了增加政策的干预外,还要根据社区实际情况,重塑乡村的文化结构。从过去忽略地方传统文化,转变成当前对地方文化元素的深入挖掘,以经济为着眼点、文化网络为连接点,共同建构政府、精英与村民三者关系,政府除了带领农民进行经济增收外,还要团结村民、回归农村。二是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利用优秀乡村人才在乡村社会内进行价值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价值观念,整合村庄凝聚力。增加乡村各种文娱活动、恢复传统节日庆典等,把“观念”有机融合于乡村社区之中,进而重振乡村精神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动力。三是,通过乡村空间进行文化的再集体化与再仪式化。实现个体成员价值重塑外,要加强对村落弱势群体的关怀照料,村落个体的基本生存与生产得到基本保障,重新赋予个人的归属感。同时,依靠日常生活中礼仪实践、仪式活动来

强化社群网络的连接,以此提升整体社群的动力与活力。

总而言之,农业文化遗产与当前国家的发展理念存在着历史性与社会性联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对于乡村文化的重构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源性动力。在国家发展层面,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我国后工业化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提供经验基础。在社会治理层面,农业文化遗产中优秀的礼俗规范对乡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创新路径。因此,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应该从一种保护性的文化遗产,转变为与社会“共生性”发展的系统性文化空间。农业文化在强调空间单位群体的历史关联同时,更应把农业文化遗产看作“家园式”的生活空间,突出个体生命意义在此内的延展性和存在性^[48]。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文化遗产才能展现出新时代的生命力,才能为后工业时代,人类如何发展提供足够的借鉴经验,为乡村振兴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 [1] 闵庆文.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回顾与前瞻[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5(6):1-9.
- [2] 赵飞.守护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乡风文明的根和魂[N].南方农村报,2022-04-26.
- [3] 刘淑兰.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16(2):78-83.
- [4] 闵庆文,骆世明,曹幸穗,等.农业文化遗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2,39(5):856-868
- [5] 张国臣.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6):23-27.
- [6] 杨伦,王国萍,闵庆文.从理论到实践: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模式与典型经验[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5(6):10-18.
- [7]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J].中国农史,2019,38(6):113-121.
- [8]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C].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卷,2005:282-310.
- [9] 李志农,乔文红.“发明”与重构——论云南维西玛里玛萨人的文化自觉[J].思想战线,2011,37(1):141-142.
- [10] 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7-96.
- [11] 吴春梅,梅欢欢.村庄公共性建设[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14-121+165
- [12] 乌丙安.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EB/OL].(2012-07-01)[2022-10-28].<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NewsID=10397&Page=6>.
- [13] 甘满堂.福建宗祠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与提升路径[J].东南学术,2019(4):110-117.
- [14] 梁永佳.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以大理Z村空间差异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8,33(3):92-114+244.
- [15]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1):7-24.
- [16] 徐姗姗.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J].东南学术,2009(5):13-19.
- [17] 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J].人文杂志,2010(2):175-180.
- [18] 陈寒非,高其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J].清华法学,2020,14(4):5-17.
- [19] 王留鑫,赵一夫.文化振兴与乡村治理: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2(4):100-105.
- [20] 朱启臻.生存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5-137.
- [21] 刘婷婷,俞世伟.乡村德治重构与归位:历史之根和现代之源的成功链接[J].行政论坛,2020,27(1):24-30.
- [22] 何仁伟,杨慧,张海朋,等.城乡“对流”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J].中国沙漠,2022,42(4):32-40.
- [23] 刘彦武.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7(10):5-13+190.
- [24] 陈加晋,卢勇.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事业:时代转向及历史方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3):60-73.

- [25] 张英魁,徐彩勤.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治理对策——基于山东省莒县柏庄古村的考察[J].长白学刊,2015(5):117-126.
- [26] 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J].学习与实践,2013(10):91-100.
- [27] 贺雪峰.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J].思想战线,2020,46(4):129-136.
- [28] 夏志强,付亚南.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4(4):39-45.
- [29] 梁筱深.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0] 刘昂,王露璐.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伦理研究:进展、现状与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6(3):121-126.
- [31] 李三辉.我国乡村治理脉络演进与未来应关注方向[J].乡村科技,2020,11(25):12-13+16.
- [32] 蒲实,孙文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8(11):90-93.
- [33] 王方晗.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生产保护中的遗产运营与遗产增值[J].山东社会科学,2022(7):48-56.
- [34] 朱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J].河南农业,2021(8):1.
- [35] 吴必虎.基于乡村旅游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J].社会科学家,2016(2):7-9.
- [36] 廖军华.乡村振兴视域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J].改革,2018(4):130-139.
- [37] 崔海洋,苟志宏.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及展望[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2):66-73.
- [38] 毛巧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16-121.
- [39] 徐建宇.村庄党建嵌入村民自治的功能实现机制:一种实践的主张——基于上海J村“巷邻坊”党建服务点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5):48-58+156.
- [40] 闵庆文,骆世明,曹幸穗,等.农业文化遗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2,39(5):856-868.
- [41] 王佳璐,叶敏.从自然联系到工作联系:农村基层党建联系机制变迁[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24(4):24-33.
- [42] 梁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9-127.
- [43] 张新文,张龙.乡土文化认同、共同体行动与乡村文化振兴——基于鄂西北武村修复宗族文化事件的个案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4):19-28.
- [44] 张红阳,李传喜.乡土认同:一种认同研究的新方向——基于浙江星村的个案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4):72-77.
- [45] 郭苏建,王鹏翔.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2-75.
- [46] 任超.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治理”实践机制研究——以北京市D区T村武吵子为例[J].中国西部,2018(4):52-59.
- [47] 苏岚岚,彭艳玲.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农业技术经济,2022(1):34-50.
- [48] 彭兆荣,李春霞.遗产认知的共时向度与维度[J].贵州社会科学,2012(1):5-11.

(上接第13页)

- [8] 朱海波,毕洁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方向与政策调试——针对“三区三州”脱贫地区的探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80-90.
- [9] 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9):3-13.
- [10] 王留鑫,赵一夫.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2(1):97-102.
- [11] 杨世伟.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内蕴意蕴、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4):125-135.
- [12] 刘优辉.聚焦绿债市场发展引资浇灌“农业绿”[J].金融市场研究,2018(8):46-51.
- [13] 滕王慧.“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发展——以广西农村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6(S1):85-87.
- [14] 金太军,薛婷.乡村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J].理论探讨,2020(4):158-164.
- [15] 许月丽,王飞.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J].财经研究,2015,41(5):4-13+101.
- [16] 陈晓华.突出扶持重点,切实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带动能力[J].农业经济问题,2020(11):4-7.
- [17] 董宁.发展绿色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现状与路径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20(11):86-89.
- [18] 杨林,邹江.绿色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逻辑框架[J].西南金融,2019(5):39-47.
- [19] 邓远建,马翼飞,梅怡明.山区生态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J].生态经济,2019,35(6):49-55.
- [20] 文丰安.新时代加强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可行途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9(6):32-38.
- [21] 吴钢,赵萌,王辰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支撑体系研究[J].生态学报,2019,39(23):8685-8691.
- [22] 郭滕达,赵淑芳.绿色技术银行:来自中国的探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31-137.
- [23] 彭宝玉,张庆华,李小建.制度变迁下国有商业银行农村服务网络演化——以农业银行兰考县支行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2):13-22.